梁德元：受尽酷刑 宁死不屈

1933年春，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委在靖远县组织领导了震惊国民政府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兰州水北门兵变，吓得南京国民政府坐立不安，蒋介石急令兰州驻军和西北“诸马”（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联合镇压这次兵变。就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梁德元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化名梁干丞，与张德生一起，迎着塞上怒吼的风沙，赶到兰州参加特委工作。他先任特委军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了特委书记。

梁德元，字子修，190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乔官镇梁家庄。1910年其父病故后，他依靠母亲和兄长生活。1911年在本村上学，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21年，梁德元考入青岛公立职业学校商科班。他来到青岛后，一边学习功课，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各项活动。1924年11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任青岛团地委学生部委员。1925年7月，青岛成立进步学生组织——新学生社，梁德元任委员长。

1925年下半年，青岛党团组织遭敌人破坏。在此情况下，梁德元离开青岛去浙江，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校期间，曾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尹宽的秘书。1928年艺专毕业后，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到湖北洪湖苏区当过红军学校教官，担任过秘书长等职，后又去河北省工作。

1931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派梁德元到山西，任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发动平定县高桂芝部兵变，事后又被派到红二十四军工作。1932年春，梁德元任陕北特委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安边小学教师。同年6月，赴宁夏银川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中共宁夏特支，任特支负责人。是年冬天，梁德元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紫姑》的文章，描写苏区群众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这篇文章引起了马鸿逵警特机关的注意，不久将梁德元逮捕。

1933年春，梁德元在宁夏被营救出狱后，陕西省委派他到兰州特委工作。为便于进行革命活动，特委通过进步人士杜汉三，为梁德元在国民党邓宝珊的新一军教导队谋取了一个政治教官的职务。

梁德元到教导队后，首先成立了俱乐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进步的宣传活动。他发动学员定期出墙报，自编油印教材，宣传进步思想。在给学员讲课时，他有意识地介绍“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的来历和《国际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在讲述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巧妙地穿插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苏联的十月革命，并以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中国历史人物为例，启发教育学员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多做一些对人民群众有意义的事情。在梁德元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下，教导队的学员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梁德元带领特委的同志，以隐蔽的斗争方式，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和条件，狠狠揭露和打击敌人。当时，蒋介石的嫡系朱绍良由江西调任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上任后，对内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对外乱杀乱捕，疯狂反共。为了打击朱绍良的嚣张气焰，曾在江西进行过革命活动的梁德元带领特委的同志秘密印制了大量的标语传单，布置人员秘密张贴、散发。一时间，揭露朱绍良罪行的标语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有的还贴到了省政府的中山堂和朱绍良的家门口。与此同时，梁德元组织兰州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活动，痛打朱绍良的忠实走狗省教育厅厅长谭克敏。上述活动的开展，使敌人陷入一片惊恐慌乱之中。

其间，梁德元还布置地下党员，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场合大造“中央军一来，杂牌军就站不住脚了”的舆论，他还在教导队、特务营以隐晦的方式，告知官兵们蒋介石的中央军时刻都想吃掉地方军，造成敌军之间互相猜疑，加剧了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和打击敌人，梁德元制订了一份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打入国民党军队和政权内部的特别方案，并组织实施。

在白色恐怖下，梁德元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忘我为党工作。白天，他除了在教导队讲课外，还要挤出时间接触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情。晚上，为了确保安全，他不断变换住所。酷热的夏天，人们都在户外纳凉，而他却把窗户挡得一丝光线不露，忍受着闷热和蚊虫的叮咬，通宵达旦地伏在昏暗的小油灯下，起草党的文件和编写各类传单。他把全国的革命形势，湘赣等地党和红军的活动，南方各地工农运动的发展，苏区的大好形势，苏联的革命经验，以及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革命活动的滔天罪行，简明扼要地刻印成64开的小册子。为启发教育国民党官兵，有时传单上也编写各地的兵变情况和描写士兵受压迫的诗歌，并仿照《苏武牧羊》等曲调谱上曲。为了躲避敌特的耳目，天刚蒙蒙亮，他就将传单和从教导队提来的油印机带走。仅在木塔巷山东会馆一地，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编印了10多期传单。

在严峻的斗争岁月里，梁德元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把每月的薪金，几乎全部用作党的活动经费，自己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全天只靠一顿锅饼加白开水充饥。他同甘宁青特委军委干部王健三生活在一起时，两人合盖一床破棉被，衣服破了，自己补一补，互相替换着穿。有时候，两人只买些洋芋煮煮当饭吃。

1933年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梁德元领导的甘宁青特委。8月7日上午8时左右，国民党一师二旅五团倾巢出动，包围了兰州东校场，该团团长兼省警察局军警督察处处长杨德亮和副处长汪大燧，带领反动军警，闯入校场北营房，将梁德元逮捕。

梁德元落入敌手后，敌人欣喜若狂，妄想从梁德元身上打开突破口，将甘肃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但是，在审讯中，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反动军警头子——国民党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军法处处长兼军警督察处副处长刘荫远和军事法官徐继祖，梁德元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反革命、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敌人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还是得不到有关甘肃党组织和党员的任何口供。黔驴技穷的敌人，见硬得不行，便搬出了省主席朱绍良来和梁德元“谈话”。尽管朱绍良软硬兼施，耍尽花招，但得到的仍是梁德元对他的无情揭露和痛斥。朱绍良恼羞成怒，叫手下人对梁德元施以各种酷刑。梁德元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痛苦的折磨，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表现了共产党员不畏牺牲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

经过两个多月的刑讯，敌人在绝望之后，终于对梁德元下了毒手。1933年10月19日黎明，兰州安定门外阴森荒凉的城隍行宫里，突然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年仅29岁的中共甘宁青特委书记梁德元倒在了血泊中。

（据山东英烈网）

震撼西北的安边起义

安边地处晋、陕、宁、蒙要冲，是陕北政治、经济、军事重镇。1939年春夏，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简称新十一旅）由榆林三岔湾移防安边。该旅下辖两个团。旅部和一团团部驻安边，一团一营、二营、三营分别驻砖井、白泥井、定边城郊，二团所辖各营驻防靖边县宁条梁（梁镇）、堆子梁等地。

抗日战争时期，安边一带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新十一旅起义前夕，地下党员已发展至500多名。他们在中共绥德特委和三边分（地）委的领导下，利用组织军事学习、文化学习、读书会等形式进行革命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44年春，新十一旅旅长陈国宾在安边病逝。以二团长史钫城为首的一批反动军官积极活动，企图拥史出任旅长。一团地下党组织分析认为：现任一团长曹又参拥护我党各项抗日主张和政策，又是新十一旅创始人之一，且深受众望，他能接任旅长，将有利于党的各项工作开展。党组织决定由李树林（一团团副）到榆林说服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在分析各种形势后，决然任命曹又参为代旅长。曹又参接任代旅长后，一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又名李友竹）两名共产党员外，团里还增加了思想进步的王子庄任参谋主任。13个连长中，有11名是共产党员，党组织基础稳固，进步力量迅速发展。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夜，三边分委指示新十一旅党组织，一方面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迎接抗战胜利到来，一方面积极培训干部，团结进步力量，发展外围组织。对所有官兵普遍进行民主革命思想教育，同时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率领全旅起义。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蒋介石认为榆林邓宝珊和左协中二十二军反共不力，驻安边的新十一旅不可靠，于是命胡宗南将二十二军和新十一旅共编为一个军，何文鼎任军长。代旅长曹又参得知消息后，亲赴榆林向邓请示。曹又参走后，史钫城、吴棻、张鼎丞、任怀义等反动军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安边城内四处游说串联，瓦解一团。张鼎丞、任怀义对一团三连连长、共产党员赵武臣说，一团如不去包头接受整编，二团就要于10月28日开进安边城，以武力解决一团！紧急时刻，赵武臣立即向地下党组织做了汇报，经研究认为：10多年来，党在新十一旅的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起义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遂派党员冯世光和进步人士王子庄到定边向警三旅旅长兼三边地委书记贺晋年汇报安边情况。经三边地委请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新十一旅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先发制人。同时派警三旅八、九两团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10月24日晚，新十一旅地下党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拟定起义方案，并成立了以牛化东为总指挥，王子庄为副总指挥的起义指挥部，同时派高昆山去白泥井二营防地，传达起义命令：调二营朱子春六连来安边，供指挥部机动使用；严密监视宁条梁方面史钫城二团的动向。

1945年10月25日拂晓，震惊西北大地的起义枪声在安边打响了。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部队分头行动，紧闭城门，切断对外联系。起义队伍首先逮捕了副旅长吴棻和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以及国民党驻安边县党部书记谢永鹏、公安局局长、邮电局局长、税务局局长等人，并击毙拒捕的反动军官张鼎丞，县长连友贤跳城墙逃跑。接着，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机关，时近中午，拿下全城。当日下午，支援起义的警三旅一部在副旅长吴岱峰、参谋长张文舟等领导下进入安边，受到全城军民的热烈欢迎。至此，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全部共2000余名官兵在安边起义获得成功。

起义后不久，贺晋年陪同曹又参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对曹又参说：你们是火车头！又拉着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这个头你们开得好，革命不分先后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少奇等同志设宴欢迎曹又参一行。新十一旅的安边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中发生较早的一次反蒋爱国起义。它发生在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时刻，这次起义不仅拔除了国民党长期盘踞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据点，解放了三边地区周围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新十一旅这支旧军队自身获得新生，也沉重打击了蒋、胡集团的嚣张气焰，壮大了三边地区的革命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斗志，为其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100余次、17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据学习强国）

“金豆豆，银豆豆，投到好人碗里头”

陕甘宁边区的投豆选举

投豆选举照片。

拥护谁，就把手里的豆子投在谁的碗里头。为了帮助群众选出心中信任的“官”和政府，投豆选举的形式在群众的呼声中一步步演变。

延安革命纪念馆内展览的“投豆选举”照片，讲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民主选举故事。

不断改进的“投豆选举”法

一张大桌子上摆着8个碗，桌后站着一队老乡，老乡手里握着粮食豆，大家按顺序投进碗中，这是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的场景。

从1937年5月至1946年3月，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3次民主选举，选举方式主要有3种：普选、竞选、投票。

对于群众来说，最有趣的就是投票选举法。“那时候当地的百姓文化水平很低，大多不识字，更别提写选票了。于是诞生了一些有趣的选举方式，最有名的就是‘投豆选举’法。”延安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工作人员冯延宁说。

起初，豆选不是秘密选举。一个个大碗放在被选举人面前，每位代表拿一颗豆子，拥护谁，就把手里的豆子投在谁的碗里头，得票多者当选。没过多久，大家就开始质疑投豆子的公正性，于是，被选举人转过身去，投豆子的大碗放在了被选举人的身后。

后来，大家又产生了质疑，大庭广众下投豆还是有漏洞，于是，在屋子内设置了一个“秘密投票站”，候选人不用到场，每个碗写上他们的名字，监票人告诉选民每个碗代表的候选人，选民一个个进去轮流投票。

“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的事”

“当年，边区群众很看重选举，用陕北话说，就是‘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的事哩’，大家要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每个人心中都领悟到了‘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冯延宁说。

一时间，民主之风在边区盛行，一首歌谣在群众中广为传唱：“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

为了保障边区民主选举的广泛性和选举流程的透明性，边区还出台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条例中有这样一条规定：除卖国者、罪犯和精神病人外，凡居住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后改为18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当时流传的一首《乡选歌》，就反映了群众的心声：男女都来到，会议开热闹，检讨工作真不少，全要转变好；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白婷婷说。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

因为投票选举带来的强烈参与感，边区人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高涨。慢慢地，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波民主选举浪潮，从“三三制”开始掀起。

“三三制”最早来源于一次征粮委员会的公选。延安县（今陕西省延安市）中区五乡为了突击完成征粮工作，打算用民选的方式，组织征粮委员会，根据居民总数，最终决定每十二三户居民公选出1名代表。

在最后选出的27名代表中，共有9名共产党员，剩余18人都是非党人士，而这些非党人士中包括富裕户和绅士。在老百姓的支持声中，征粮委员会的代表们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

得知这件事后，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士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工作，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

1940年3月11日，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会上，“三三制”政权更加明确了。毛泽东说：“在‘三三制’政权中，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

社会中不同角色的人，都能参与其中“管政权”。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逐渐成为其他根据地的样本。

“老百姓选的才能叫正式政府”

既然要实行“三三制”，就要彻底地实行。一则《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发布，“三三制”不仅要在民意机关实行，也要在政府机关实行，要“仔细的（地）、有步骤的（地）、大胆的（地）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

不仅如此，对于民主政治来说，选举一定处于第一位。边区政府向各分区、县发出了一则指示信，信里写道：“未经过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必须有老百姓选举，才能叫正式政府。”

“‘三三制’逐渐深入人心，大家都说，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因此，每个人都很看重自己手上的那一票。”冯延宁说。

到了选举日，各选举点像赶庙会、过年、过节一样，有抱着娃娃、揣着馒头参加选举的；有大闺女、新媳妇穿上新装、搭伙结队参加选举的；有之前足不出户的小脚老太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的，男女老少一齐出动。

“三三制”是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体现，它是最民主、最廉洁、最富有朝气、最受人民欢迎和拥护的政策。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据《华商报》）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陕甘宁边区火柴厂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6年，红军先后举行东征、西征战役，陕甘苏区进一步扩大。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甘苏区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达固原，东到黄河，总面积12.96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设有36个县和1个特区。1937年3月，改称陕甘宁特区，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党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号召群众，在有限的资金技术条件下，充分利用现有的各项资源，从零开始建设和发展边区工业，以保证抗日战争和民生供给的物资生产。

1940年，党在山西省晋西北关帝山诞生了延安丰足火柴厂，该厂是由国民党阎锡山所办的火柴梗厂接收过来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晋西北行署决定，将该厂迁往陕甘宁边区。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搬迁过程中采用人抬、驴拉、驼运等简陋方法，耗时1年多，历尽艰难险阻，于1942年到达陕北延安。

1944年3月，选址在延安北郊狄青年村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火柴厂，属于八路军公营企业。厂长为杜子秀，书记林涛，副厂长尹希圣，全厂20多人。1945年初，火柴厂迁至石圪塔村，厂房和宿舍则由土窑洞或牲口棚改建而成。

当时，该厂在技术力量、机器设备、化工原料等方面十分缺乏，于是党组织决定：安排技术人员研究试制黄磷和氯酸钾，争取自力更生解决原料问题；同时派员去敌占区通过地下组织购买制造火柴的机器和原料。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在各部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支持下，终于在1944年3月1日投产并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批火柴。

由于当时正值延安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于是周恩来将火柴定为“丰足”牌。

火柴商标由鲁迅艺术学院设计，正中“丰足”由两支麦穗环绕，果硕叶茂，象征丰衣足食。火花背面“边区巩固生产发展”（后改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8个字，并在侧面标注厂名。火花4个角分别是“顶上火柴”4个字，这是由任弼时提议加上的。

该厂在建厂初期除了制造火柴梗片部分是机器生产以外，排梗、卸梗、粘药头、装盒、包封等工序都是手工生产。全厂职工只有20多人，他们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既是生产工人，又是战斗队，生产情绪很高，日产量可达3万多盒，满足了陕甘宁边区的军需和民用。此后，火柴产量逐年上升。1946年，火柴厂迁址安家寨，改名为延安丰足火柴厂。1947年胡宗南侵占了延安，全厂职工跟随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一面生产，一面打仗。

1947年，火柴厂迁往砖窑湾西梁村生产。转战陕北时，火柴厂工人掩埋了机器，投入解放战场。但是火柴厂的工人，每人都算称得上是一个火柴生产小厂，因为他们身带火柴生产余下的材料，一边行军打仗，休息时间就蘸晾火柴、糊盒包装，直到用完火柴材料为止。1948年延安光复后，7月1日，火柴厂又在砖窑湾恢复了生产，并在山西购买了蘸头机，火柴的质量和产量大幅度提高。1949年，由于生产扩大了，砖窑湾周边糊火柴盒的人少，经贾拓夫指示，火柴厂迁回延安东关黑龙沟。糊火柴盒就是延安市民的一项有偿劳动，许多家庭都为火柴厂糊盒。火柴通用每盒装50根火柴，但由于火柴盒费料费工，厂里又没糊盒工，只能调整机器改为每盒装100根火柴。由于火柴盒一时供应不上，市面销售的火柴就用秤称。

“丰足”牌火柴产量大，质量好，不仅满足了延安的需求，还大量输送到华北其它抗日根据地，更在中共七大时成为与会代表的纪念品，工厂特意在火柴盒上印上毛泽东头像，作为“七大”专用。毛泽东对“丰足”尤为钟情，他在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还将两打“丰足”牌火柴作为礼品相赠，更是高兴地对斯诺称丰足火柴火花为延安“窑洞之最”。

现陕甘宁边区丰足火柴厂旧址仅存两孔窑洞，2020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民主协商报》）